

勒馬長城何如揚帆大海

段昌國

從民國六十年的「城裏城外」到今年的「勒馬長城」，一次又一次的使我深深感覺到，遼耀東先生對長城的懷念與感情，是隨着歲月的消逝愈來愈濃厚了；歷史上的長城與耀東先生心中的長城緊密的融化在一起，環顧周遭，浪淘千古，我也分辨不出長城究竟存在戰馬奔騰的西北還是驚濤裂岸的東南海隅了，那乍憂還懼的心情，使我一再展讀：長城，勒馬！北征，飲馬？豈僅僅是發思古之幽情，還有最後的感嘆「何處是涼州？」才知他寄望涼州再現，方能「濟文武於將墜」。然則，寒山遠重，巖谷出沒，緬懷潼關萬里疆場，「陰風西北來」，「呻吟更流血」，那擾攘的大地，慘澹的長城，還能重生涼州，讓我們帳下春風，橫槊賦詩？

王昌齡詩說：「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這樣的感嘆，從胡漢相爭以來，無時不有。胡漢的鬭爭，從經濟型態發展到文化型態，最後的結局便是五族共和。遙想春秋戰國時代，胡漢也曾雜居，紛爭時起。中國西北邊陲，本是文化發源地，胡人日侵，華夏民族逐漸從草原退到河川丘陵為根據地，修築長城以抵禦。在血淚交織中，一土一石把長城建造起來。秦國統一天下，連結戰國長城，綿亙萬里，雄據於北方後，以長城為堡壘，一方面和平拓殖，把農業文化向東北、西北推進，一方面繼續武裝攘夷，把中國國境向塞外擴張，換句話說，也就是反攻回去，這樣雙管齊下，固然有利於長城內華夏文化的統一。但從反面看，也

加深了華胡文化的鴻溝，以後歷代國防備邊西北，皆以長城爲前線，國勢強時，開塞出擊，馳騁漠北；國勢弱時，據守長城；始終不退。秦代長城，尙偏重防禦性質，但漢代長城則是前進政策的灘頭堡；不斷的向西北以至中亞擴張文化勢力，民四後的考古學家們至長城沿線發掘出曆書、絹書、木簡、婆羅文，在一望無垠的沙漠中，無出產，無水滴，站在那蘆柴和上黏泥築造的城牆下，無論中外的考古學家不能不讚嘆中國人對抗自然的偉大力量。沿着長城起起落落設有瞭望臺，它是用反光鏡反射的距離來衡量位置的。城後設有驛站，傳遞前方軍情，更遠處設有倉庫，諸有衣物糧食，這充分表示漢代中國在擴張文化時是透過嚴密系統組織，步步經營的。無論東西的研究工作者不得不感嘆中國人力的偉大犧牲了。漢代文化便以長城爲堡壘，敦煌爲燈塔，光被四表，這種文化的放射力，激起了匈奴團結反擊的意志力，展開了綿亙數百年的胡漢鬭爭。在屍骨如山，血流成河上屹立不搖的長城，正是華夷的嚴明界線。從漢代以後，中國不斷的在開關與閉關之雙重循環中擴張文化勢力，華夷的界線愈益明顯，而胡漢文化的鴻溝，也愈益加深

了。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長城又成爲胡漢不同文化溝通交流的門戶。敦煌是東西交通的孔道，不僅是兵家必爭要區，也是商業輻輳之地。漢末天下大亂，不少關中人士避居敦煌，魏晉以後更爲佛教中心。考古學家在這裏發現中國古典經書的殘本，通俗文學殘卷，各種宗教文書，中國藝術品與佛像，以及西域各國語文作品，簡直是當時世界文化的大都會區。此外在樓蘭古址中挖掘出米、麥、竹簡、紙張、毛筆、古錢、陶器、漆器、漢鏡、房屋、醫院，當然最值得注意的是仿造的小長城。西方的考古學家不禁讚道那是一頁世界史的紀念碑，在龜茲、在和闐、在莎車，無不看到胡牧民族「奉漢家」的遺跡，這足可說明中國文化的聲威、經濟資源與組織能力，實遠超過軍事力量的征服，自然，這也顯示出長城的文化意義實超過國防意義。不但漢化由長城而西進，西化也以長城爲門戶東傳，當時中亞最盛的波斯文化，如音樂、雕刻、宗教，還有文物如葡萄、石榴、孔雀、犀牛等，波斯商賈更在中外貿易上佔得一席之地。這些都是構成漢代中國泱泱大風的要素。所謂「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

，長城並不是絕對的界限，華夷之間仍有棧道可通，可是它也產生了反作用，限制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一直以長城為邊境，只能夷狄入中國，不曾中國入夷狄，而雄飛世界。漢以後的中國人躲在長城之後，日趨守成，對草原民族的恐懼心理却與日俱增。長城的前進意義逐漸消失，而保守意義相對的愈益增高了。

耀東先生勒馬長城，事實上更注重的是長城的和平拓殖色彩，而非武裝攘夷意義。武力有消長，因此長城有明暗，然而拓殖也有進退，長城依舊屹立不動，便也有今昔了。在耀東先生偃武修文的筆墨下，並不見壯士渴飲匈奴血那種人馬奔騰的氣象，而是一種寧靜致遠，彷彿還帶點感傷的情調。宋朝固弱，岳飛仍然有氣吞山河的襟懷，唐朝固強，那種醉臥沙場君莫笑的瀟灑也還有征戰不悔的氣致。今日何日！！莫非是辛稼軒「馬上離愁三萬里」，恨難說乎！耀東先生說得不錯，長城是農業文化成熟的象徵，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正代表了農業推廣的地理極限。塞外拓殖，屬於百姓墾荒的少，屬於軍事上屯戍的多。在那種荒寒不毛的瘠土上推廣農業種植，雖反映出中國民力的偉大犧牲與痛苦表現，然而並沒有使中國農業的

發展有多大影響。事實上，秦漢以後中國文化發展的重心不在西北，而在西南與東南。秦漢以來，為抵禦匈奴而實施屯戍開墾，可說是被動的性質，代表中國開塞出擊最典型的漢武帝曾說：「朕節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綉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這樣的籠絡，匈奴仍常寇邊，可見漢人被迫一戰的不得已。再說，古來征戰西北，青史必然留名（所謂春秋大之），被動中還有矜矜欲式的主動心理，然這終究是出自個人英雄主義。秦漢討伐匈奴，使塞外西域獲得和平，農田水利技術的西傳，使部份游牧民族轉化農耕，為了拱衛西北，中國人民積極向東南、西南拓張，更使中國歷史發展獲得強固的安定力。

當秦國開發西北以圖東進時，越人與楚人在東南與西南也積極擴張以謀北征。西元前五六〇年左右，楚國的大臣已很自豪的說：「赫赫楚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秦滅六國後，楚還有滇王坐鎮巴蜀以南之地，秦始皇將中國邊疆拓殖到閩越、滇蜀、尉為泱泱大國，事實上都是站在楚越兩國先鋒開路的基礎之上而收功的。此後，中國人民大量移民南粵，（秦始皇徙十二萬豪戶到咸陽，有一部份即散到

巴蜀)，魏晉時陶淵明作桃花源記，雖是寓言，可知秦末人口流動從中原往西南的必多。漢代時四川的大商人曾到中南半島貿易，而後不絕於途，實開今日東南亞漢化深厚的先河。三個時代文化中心便在江東與荊州，經濟與商業中心更早已轉往東南。再看兩漢人才，軍人雖多出身山西，文人却偏於南方，如陸賈（楚人），揚雄、司馬相如（蜀人）。秦漢以後，中國歷史發展重心從西北轉向東南的形勢愈加明顯。西北與東南，好比為主客之分，歷代外患侵犯主地，多自西北而來，因此經營的方略是備邊西北而拓植東南，恆以東南的財富轉為西北之用。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學風新文化亦趨向東南。唐宋以後，在朝代循環現象下出現的變局，其振衰起敝的人才，大都由新學風新文化孕育而出，明清兩代，更屬必然。甚至龍城飛將的產生也從關隴地區轉往鶯飛草長的江南。但在這種歷史大變遷的局勢下，雖然波雲詭譎，中國百姓始終知道老家何在，據守長城，保住西北不退，絕沒有「雪擁藍關馬不前」的畏縮。左宗棠抬棺西征，收服新疆（即漢之西域），湖湘子弟滿佈天山，那是何等的氣概，但也透露了中國歷史轉變的明確消息。

假如說中國農業文化向北擴張，出於國防需要，又受制於地形，是屬於被動的、靜態的保守發展，那麼，向東南的擴張，則應該屬於積極的、動態的進取發展，中國歷史便在這動靜二力和諧美中屹立不搖。這段時期的中國，北據長城，南面大海，內部又有高度成熟的文化，很自然成為亞洲歷史舞臺的龍門，開合旋轉的大關。

自越人開發，秦漢經營，孫吳的鑿深，以至明清踵事增華，完成規劃，中國人民一本開荒拓土的精神，以東南海疆各港口為燈塔，逐漸將中國農業文化放射到南洋各國，甚至遠赴重洋。這種無畏自然而以平民為先驅的精神，是秦漢開疆拓土、蔚為大國的主要原因，也是秦漢以後各代能够繼續光被四表的主要原因。然而中國本質上却是一個騎馬作戰，崇尚陸權的國家，對於這種海外開拓的事業，政府不僅無志以求，甚且多方掣肘，明代為了宮廷政治原因，曾經蓬勃一時（然而領導者却是出身甚低的內侍官），中國人民的足跡與文化的影響散佈於南洋各地。但是，大清帝國崛起後，其原本半游牧的民族背景，決定了它嚮往於陸上霸權的追求，而無意於繼承明朝海外拓殖的

聲威，雖然在開國初期，爲了平定鄭成功在臺灣的勢力，曾經訓練了一批海軍，但在一六八三年攻佔臺灣後，便偃旗息鼓，不再遠征，並無意於海上的發展。所以清廷向來偏重於塞防，對海防則掉以輕心。沿海各省只有小型船艇，分別轄屬於各省督撫，來維護水域的安全，並未組織一支統屬國家的海軍，也不曾訓練海陸聯合作戰的方法，乃是任其各爲自戰，後來總算組成一支海軍，然而每艘船只有三百噸重，一百尺長，而當時（一八〇〇年前）西洋各國的軍艦，最小的也有一千噸，清廷甚至下令不准建造大型商船，爲了怕超過海軍艦船，因此中國沿海數千里幾乎是不設防的疆界。

就在這時，海路大開，原來是天然鴻溝的茫茫大海不能再限制人類的活動，西方文化的勢力陸續湧入，而且一反過去的常例，不從西北方面來，反以東南海疆爲跳板，逐漸波及全中國，使得長城失却了歷史上的意義與地位，而客取主勢，東南的無備，反使得西方勢力可以一瀉千里、長驅直入。這種違背傳統歷史發展潮流的趨勢，中國先則茫然無知，繼則手忙腳亂，疲於應付。中國無疑被迫從亞洲的舞臺步入世界

大舞臺上，傳統的文化不足以適應這種新形勢，勢必重加調整；傳統的社會不再能保持原來光榮孤立的地位，勢必有所更張。值得警惕的是，西方挾堅船利礮以爲新帝國主義的利器，遠比塞外異族更爲兇猛猖狂，中國被迫委屈讓步以求生存，而原來的長城已成爲供人憑弔的歷史陳跡，必須另建一道「長城」來抗拒抵禦，也必須另設一個門戶來溝通中西不同的文化。近代中國史上，我們看見前者滙聚成一道無形的心理長城——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後者形成廣州的特殊地位和制度——彷彿一座中西合璧的燈塔，逐漸照耀到上海、天津，在沿海地區串連起來，好比在中國這個破舊的棉襖上，綴飾出一道光彩奪目的花邊來。

這種震撼中國的變動中，兩廣地區得天獨厚，脫離樊籠而出，一則西方勢力由此滲入，削減了清廷的威勢，二則兩廣是最後降順滿清的地區之一，會黨密佈，時有反抗。中西兩種勢力激盪下，兩廣形成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誕生的苗床。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兩廣根深柢厚，洪楊革命後八股科考權威性大受打擊；西方政教文化又乘桴而來，涵養舊學，轉益

新知，近代中國那些經天緯地的人才，維新派、革命派的倡導者，莫不從兩廣地區孕育出來，耀東先生感慨萬千憶涼州，涼州應該在那兒呢？

中國崇尚陸權，向來偏重塞防，在長城衛護下，當傳統中國動亂之時，中興機運往往來自江北，所謂置之死地而復生。這種憂患意識，是中國歷代就兢以求陸上霸權國的基本原因。雖在近代外患大舉沿海而來，林則徐猶嘆「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這是最典型的農業中國對草原民族戒慎戒懼的傳統心理。長城雖「失去了原有作用」，這種傳統變患仍然雄據在中國人民心中，西潮儘管波瀾壯闊，中國何曾在歷史上一蹶而不振？爲了拱衛西北家鄉，在騎射時代，我們修築長城，「車遶遶，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飲馬而北征。在船礮時代，我們變法自強，「紅日又西沉，白浪長東去」，更唱水龍吟。我們不怕長城被拆，事實上，「西風」殘照下，長城何異漢宮闕，怕的却是那種憂患意識在中國人民心中逐漸地淡忘不存了。

大江東去，而今偏處在東南海隅一島，環顧左右，浪濤洶湧，豈非像劉禹錫所說，「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在那驚濤裂岸，明月如霜下，「更無一點塵隨馬」，馳騁大漠金山，究是一番神遊，何況縱騎遠出，豈不是以下駟而對上駟？二千餘年來，飄洋過海散佈全球各地的中國人民，遠超過晚清時期的兩廣地區，我們安身立命的這個島上所凝聚的新學風，新文化更有甚於當年的廣州，傳子弟其薪，遣海隅其神，未嘗不能重整山河。燕趙的長城，秦漢修之，而更見其雄偉，唐宋的長城，明清重建之，而愈益綿長。城雖傾倒，江山依舊如畫，何能不重起？我們所懷想的並不是那一土一石矗立不搖的長城，而是長城背後，中國人綿亙萬世歷久彌新的憂患意識，是那故園山河絕不容異族侵佔的豪情壯志。當劉寄奴駕長車，踏破板蕩中原時，辛棄疾感嘆的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但當來年吾輩泛海駕舟登臨重陽地，稼軒若在，感慨的又是什麼呢？然而從一個曾寄情陸權要轉往海權稱世，那豈僅是遙遠的轉變，更是一個要突破歷史古今傳統的奇變。二十餘年來，老驥伏櫪志難伸，猶未知揚帆大海浮波來，世變日亟，「坐覺妖氣豁」，實不能不興起「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的感慨了。